

旅游业发展有利于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吗?*

王佳莹¹ 张辉²

(1. 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0;

2.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44)



内容提要:要素收入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如何优化资本和劳动要素分配结构,是发挥初次分配基础性作用和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课题,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旅游业等新型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与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中国31个省份1998—2020年的面板数据,深入探究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旅游业发展能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并降低资本收入份额,有利于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旅游业发展对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正向作用在西部地区表现更为显著;时间异质性分析表明,其正向影响在2008年后开始凸显;分位数异质性分析表明,其正向影响在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分位处更为突出。本文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征和旅游收入效应视角,证明旅游业发展能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不仅有助于丰富和拓展要素禀赋等相关理论在旅游业等新型服务业中的应用范畴,也能为发挥旅游收入效应在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中的积极作用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旅游业发展 要素收入分配结构 劳动收入份额 旅游收入效应

中图分类号:F590;F244;F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3)06—0193—16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雷琼,2022^[1];王思斌,2022^[2])。然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探寻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水平的外部因素(郭庆旺和吕冰洋,2012)^[3],而较少关注其内部要素分配结构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高敬峰和张艳华,2014)^[4]。事实上,作为协调国民收入在资本、劳动、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要素收入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对收入分配格局具有基础性影响(刘亚琳等,2022)^[5]。劳动和资本要素作为其中占比最高和影响最大的两大基本要素,其内部分配份额直接关乎初次分配的效率和公平。而且,作为衡量我国共同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劳动收入份额的高低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多寡。但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一直处于较低状态,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李稻葵等,2009)^[6]。因此,探究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和优化内部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是发挥初次分配基础性作用和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矛盾的重要

收稿日期:2022-11-25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农户生计变迁与农地利用行为演变研究”(41801123);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外部冲击下家庭型旅游小微企业韧性研究与可持续生计研究”(2022SJYB2120);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新发展格局下江苏城乡居民文旅消费升级研究”(2022SJD0207)。

作者简介:王佳莹,女,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是旅游宏观经济与旅游企业运营,电子邮箱:wajy@yzu.edu.cn;张辉,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旅游经济与旅游产业运行,电子邮箱:peihui1@sina.com。通讯作者:王佳莹。

议题。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量研究论述了传统制造业及国际贸易等产业发展与要素收入分配结构间的相互关联,提出其产业资源、土地、设备、区位等资本收入要素价格比劳动收入要素更高(侯俊军和钟灵子,2019)^[7]。因此,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及传统行业的飞速发展,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矛盾日益突出。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其劳动收入份额也在不断升高,与农业部门份额不断降低、工业部门份额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截然不同(刘亚琳等,2018)^[8]。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制造业等传统行业中的劳动和资本要素分配结构,而较少关注新型服务业与要素收入分配内部结构之间的影响。

旅游业作为新型服务业中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能为社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有效提高居民劳动收入,具有突出的旅游收入效应,可以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一定影响(胡文海与柳百萍,2009^[9];王松茂等,2020^[10])。与此同时,作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旅游业发展也能通过提高劳动者知识技能和技术创新(刘英基和韩元军,2020)^[11],有效提升劳动收入要素的议价能力和边际收益。伴随旅游市场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发展趋势,消费者将更加注重旅游服务产品的“软实力”(胡文海与柳百萍,2009^[9];苏建军和孙根年,2017^[12]),从而使劳动力、技术创新、文化创意等劳动要素投入更为重要(王松茂等,2020^[10];刘英基和韩元军,2020^[11])。因此,随着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不断发展,旅游业与劳动要素份额之间的相互关联日趋密切(苏建军和孙根年2017)^[12]。然而,旅游业与目的地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物质资本投入也存在密切关联。那么,旅游业发展是更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还是资本收入份额?旅游业发展能否优化其内部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对此,虽然少量研究已关注旅游产业内部的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结构对旅游经济的影响作用(刘英基和韩元军,2020^[11];苏建军和孙根年,2017^[12]),但尚未从劳动密集型特征和旅游收入效应视角,进一步探究旅游业发展对宏观国民经济要素结构的影响效应。

综上,本文在构建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影响的理论框架基础上,运用中国31个省份1998—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旅游业发展对劳动和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并从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和不同分位处分别探究其异质性影响。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第一,对于如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水平的外部因素,而较少关注其内部要素之间分配结构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本文从要素解构视角考察了收入分配差距的内部要素分配结构,既能拓展现有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视角,也可丰富旅游业社会经济影响的应用范畴。第二,对于如何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现有研究重点论述了传统制造业等资本和劳动收入要素的分配结构,而较少关注新型服务业及其相互关联。本文基于旅游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征视角,深入探析旅游业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效应,有助于丰富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等传统经济理论在新型服务业中的研究范畴。第三,对于旅游公平性研究,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探寻旅游业发展与收入差距水平之间的影响关系,却较少关注其与产业内部要素分配结构之间的相互关联。对此,本文从旅游收入效应视角考察了旅游业发展对劳动和资本要素分配结构的影响,既能深化和拓展旅游公平性等相关理论,也能为如何发挥旅游收入效应在优化要素分配结构和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中的积极作用提供有益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由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可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要素会向生产率和边际收益更高的产业不断转移,即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不断转移(郭宇航和孔微巍,2020)^[13]。与传统制造业不同,旅游业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其人力资本等

劳动要素可能比物质资本等资本要素更为重要。因此,本文将从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两个方面,构建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影响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见图1)。



图1 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影响的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1. 旅游需求视角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更加注重精神生活质量及全面发展。作为五大幸福产业之首,旅游已成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旅游业有助于人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和陶冶情操(王佳莹,2021)^[14]。随着旅游业态的不断升级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旅游者将不再重点关注硬性接待服务设施及其他资本要素投入,而将更注重其软性服务品质和人文体验价值(Alam和Paramati,2016)^[15]。

因此,人力资本等劳动和人文要素投入可能是决定旅游产品竞争力的关键要素(苏建军和孙根年,2017)^[12]。当旅游目的地基本满足旅游者的物质需求时,增加劳动和人文要素投入将更利于增加旅游产品的文化性、知识性、创意性和趣味性,并能进一步提高其要素价格和收益(Sun和Lu,2005)^[16]。相反,若旅游目的地仍持续增加资本性要素投入,不仅不利于进一步提高旅游产品竞争力,还可能引发“同质化”及经营亏损等问题。例如,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旅游者更愿与当地劳动者共同参与和体验刺绣、剪纸、编织、陶艺等传统手工艺,而不是参观物质资本投入更多的同质化人造景观(Alam和Paramati,2016)^[15]。而且,随着旅游市场需求的不断升级和个性化发展,劳动要素对住宿接待、导游讲解、文创体验、特色饮食,以及地方特产生产、加工、销售等其他旅游相关产业作用也会更加突出(刘英基和韩元军,2020)^[11],从而能更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而非资本收入份额,并对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2. 旅游供给视角

首先,旅游业具有典型劳动密集型行业特征,其人工成本或劳动要素投入对提升旅游产品服务作用突出,具有显著的旅游收入效应。旅游业发展可有效带动当地社区留守人员或贫困人口就业(胡文海和柳百萍,2009)^[9],尤其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旅游业可吸引和带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与此同时,基于旅游业突出的产业关联性特征,其相关产业如旅游餐饮、基础设施维护、导游讲解、住宿接待、游乐项目管理、地方特产,以及文创非遗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均可为当地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具有突出的社会综合效益(胡文海与柳百萍,2009^[9];王松茂等,2020^[10])。由此可见,旅游业发展可通过带动社会就业和增加劳动报酬等旅游收入效应,不断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而且,在文化创意、休闲度假、生态农业、体育康养、手工艺民俗等旅游新业态发展中,其人文要素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可能比物质资本投入收益更高(苏建军和孙根年,2017)^[12],从而使旅游业发展更利于提高人力资本等劳动要素的价格和收益,并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

其次,由资源稀缺性原理可知,基于有限的要素供给与无限的市场需求矛盾,当某投入要素越稀缺,则其价格和收益也会更高(Sun 和 Lu,2005^[16];郑新业等,2018^[17])。而且,基于旅游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征,当不断增加旅游业劳动要素投入时,其旅游服务质量和旅游产品竞争力也会不断提升(苏建军和孙根年,2017)^[12]。因此,随着旅游公共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并能满足旅游者的基本物质需求时,劳动要素就会成为其稀缺要素(Atkinson,2000^[18];郭庆旺和吕冰洋,2011^[19])。当进一步增加旅游供给中的劳动要素投入时,就能更利于提高劳动要素价格和边际效益,从而有效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与此相反,当旅游资本要素可以基本满足旅游者物质需求后,物质资本要素价格和收益会逐渐降低,从而变为非稀缺要素。当旅游企业或目的地进一步增加物质资本投入时,则不能有效提高其产品竞争力,甚至可能增加旅游目的地亏损和破产等经营风险,并引发旅游目的地利益分配不均等社会矛盾(Alam 和 Paramati,2016)^[15]。而且,对于旅游餐饮、住宿接待、公共交通、文体传媒、休闲娱乐,以及旅游商品生产、加工、批发、零售等其他劳动密集型相关产业,增加劳动要素投入也能更利于提高产品综合竞争力(王松茂等,2020)^[10],使其进一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并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

最后,旅游业发展还能通过促进跨区域要素流动而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基于旅游市场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旅游业发展还能通过区域间的财富转移和收入再分配(Incera 和 Fernández,2015^[20];Bowden,2005^[21]),间接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一般而言,经济较发达地区存在更大的旅游市场需求和更强的旅游消费能力,且欠发达地区往往具有更突出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王松茂等,2020)^[10],可产生明显的财富转移和收入再分配,并通过“消费经济”进一步提高居民的劳动收入,从而更利于提升劳动要素份额(王佳莹和张辉,2021)^[22]。而且,伴随旅游市场的跨区域流动,旅游业发展还能进一步促进区域间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其他生产要素流动,并能通过改变其要素价格和收益进一步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结构(Yang 和 Fik,2014)^[23]。此外,伴随旅游者跨区域流动,旅游业发展还具有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对提升劳动者认知能力、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等具有积极作用(王松茂等,2020^[10];王佳莹和张辉,2021^[22]),并可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议价能力(王坤等,2016)^[24],从而能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₁:旅游业发展能有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并降低资本收入份额,从而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

三、研究设计

1. 模型设计

为探究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效应,本文首先以旅游业发展(*Tour*)为解释变量,并以要素收入分配结构(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FIDS*)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避免由个体效应和异质性对模型估计的偏差,其模型如式(1)所示:

$$FIDS_{it} = \beta_0 + \beta_1 Tour_{it} + \beta_2 X_{it} + \varepsilon_{it} + \mu_{it} \quad (1)$$

其中, $FIDS_{it}$ 表示省份*i*在*t*年时的要素收入分配结构, $Tour_{it}$ 表示省份*i*在*t*年时的旅游业发展水平, X_{it} 表示*t*年影响省份*i*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控制变量, μ_{it}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劳动和资本要素在分配结构中的绝对占比优势,本文假设旅游业发展对政府税收、地租等其他要素不存在显著影响,并将劳动和资本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近似视为零和博弈。由于文章篇幅限制,本文仅在基准模型中分别检验了旅游业发展对劳动和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作用,而在后续内生性和异质性等进一步研究中仅将劳动收入份额视为表征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核心指标。

为解决由反向因果或其他遗漏变量而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运用较为常见的工具变量法模型进行内生性分析。即在基准模型中引入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来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可同时满足与解释变量相关和与扰动项外生两个基本条件(Wooldridge, 2003)^[25],其模型如式(2)所示:

$$FIDS_{it} = \beta_0 + \beta_1 Tour_{it} + \beta_2 X_{it} + \beta_3 Tour_{it-1} + \mu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为避免相关性和异方差的干扰,本文构建了如下分位数异质性影响模型进行检验:

$$Q^q(FIDS_{it}) = \beta_0^q + \beta_1^q Tour_{it} + \beta_2^q X_{it} + \varepsilon_{it}^q + \mu_{it}^q \quad (3)$$

其中,上标 q 所示的分位点是表示劳动要素份额的分位数。

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要素收入分配结构($FIDS$)。现有研究主要通过以下三类途径来测算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第一,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中的资金流量表(实物部分)来测算不同机构部门的收入份额;第二,根据收入法 GDP 构成表,从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和生产税等要素组成来测算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第三,根据投入产出表,从不同产业部门分类核算国民收入要素。基于数据可得性,大多文献都选用劳动收入份额或资本收入份额等指标来表示要素收入分配结构(邓晓兰和鄢伟波,2019^[27];张万里和宣畅,2020^[28])。因此,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中收入法 GDP 分解结果,劳动收入份额(LIS)为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重,资本收入份额(CIS)为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占 GDP 的比重。基于一般文献做法,本文主要运用劳动收入份额来表示要素收入分配结构(郭庆旺和吕冰洋,2012)^[3],其公式如下:

$$FIDS_i = LIS_i = LS_i / GDP_i \quad (4)$$

其中, $FIDS_i$ 为 i 省要素收入分配结构, LIS_i 为 i 省劳动收入份额, LS_i 为 i 省劳动者报酬, GDP_i 则表示 i 省国内生产总值(收入法)。当劳动收入份额越高或资本收入份额越低时,其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也会更加合理(黎峰,2014)^[29]。

(2)解释变量:旅游业发展($Tour$)。基于先前研究(Liu 等,2017)^[30],本文选用最常用的旅游专业化程度,即旅游总收入与 GDP 的比值来表示旅游业发展变量。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运用旅游人次比作为其替代变量,即旅游总人次与总人口的比值。

(3)控制变量。参考现有文献(李稻葵等,2009^[6];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26]),本文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因素,具体包括:①经济开放度($Open$)。经济开放度可通过提高劳动力的吸纳作用和影响劳动者在垄断租金上的议价能力,而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结构(郭庆旺和吕冰洋,2012)^[3]。基于相关文献(赵磊等,2018)^[31],经济开放度由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GDP 的比值表征。②投资水平($Invest$)。鉴于投资水平对资本要素份额的显著影响,本文基于林爽和赵磊(2020)^[32]等相关研究,投资水平由固定资产投资额与 GDP 的比值表征。③政府干预($Govern$)。为保证经济运行效率和公平,各地政府可通过财政税收、土地政策及改善基础设施等调控方式,而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结构(郑新业等,2018)^[17]。基于相关文献(赵磊等,2018)^[31]的一般做法,政府干预由财政支出与 GDP 的比值来衡量。④人力资本($Human$)。人力资本对劳动力价格和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从而可进一步影响劳动要素份额。基于相关文献(赵磊等,2018)^[31]的一般做法,人力资本由高校在校学生数与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⑤科技创新($Tech$)。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对劳动力要素价格及资本投资回报率具有显著影响,从而会进一步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结构(郑新业等,2018)^[17]。基于相关研究(邓晓兰和鄢伟波,2019)^[27],科技创新由每万人专利授权数来表征。⑥城市化水平($Urban$)。城市化所引起的劳动要素流动及资本要素集聚,均能影响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基于相关文献(赵磊等,2018)^[31]的一般做法,城市化水平由非农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⑦消费环境($Consume$)。该变量与居民收入水

平息息相关,从而可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基于相关研究(丁任重和张航,2020)^[33],消费环境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 GDP 的比值来表征。⑧经济发展水平(*Dev*)。现有文献指出,在经济发展初期,其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出可能比劳动要素更高,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服务业的飞速发展,其产业结构和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李稻葵等,2009)^[6]。因此,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显著影响和相关文献(赵磊等,2018)^[31],经济发展水平由人均 GDP 的对数来表征。

本文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名称	变量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LIS</i>	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者报酬占收入法 GDP 的比重	673	0.488	0.072	0.315	0.704
<i>CIS</i>	资本收入份额	资本要素收入占收入法 GDP 的比重	673	0.361	0.064	0.170	0.529
<i>Tour</i>	旅游业发展	旅游总收入/GDP	713	0.124	0.084	0.016	0.735
<i>Open</i>	经济开放度	进出口贸易总额/GDP	713	0.040	0.049	0.001	0.230
<i>Invest</i>	投资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额/GDP	713	0.625	0.269	0.205	1.507
<i>Govern</i>	政府干预	财政支出/GDP	713	0.226	0.177	0.057	1.379
<i>Human</i>	人力资本	高校在校学生/总人口	713	0.014	0.008	0.001	0.041
<i>Tech</i>	科技创新	每万人专利授权数	713	5.797	10.110	0.026	74.383
<i>Urban</i>	城市化水平	非农人口/总人口	713	0.494	0.161	0.166	0.896
<i>Consume</i>	消费环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	713	0.366	0.064	0.218	0.603
<i>Dev</i>	经济发展水平	Ln 人均 GDP	713	10.031	0.926	7.768	12.009

3. 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以 1998—2020 年我国 31 个省份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效应。在数据一致性和可得性原则基础上,本文所有统计数据主要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等。此外,基于插补法原理(王天营和沈菊华,2008)^[34],本文对缺失值进行了补充。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省份劳动者报酬数据在 2017 年后缺失较多,故仅对其补充至 2018 年。

四、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1. 平稳性检验

为防止由变量的非平稳而引起的伪回归,本文首先对各样本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陈强,2014)^[35]。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运用了 LLC、Breitung、Hadri LM 同质单位根和 IPS、Fisher-ADF、Fisher-PP 异质单位根等检验方法(陈强,2014)^[35],其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同质单位根检验			异质单位根检验		
	LLC	Breitung	Hadri LM	IPS	Fisher-ADF	Fisher-PP
劳动收入份额 <i>LIS</i>	-3.799*** (0.001)	-1.679** (0.047)	27.348*** (0.000)	-2.324** (0.010)	177.829*** (0.000)	114.455*** (0.000)

续表 2

变量	同质单位根检验			异质单位根检验		
	LLC	Breitung	Hadri LM	IPS	Fisher-ADF	Fisher-PP
资本收入份额 <i>CIS</i>	-4.816*** (0.000)	-5.698*** (0.000)	21.299*** (0.000)	-5.147*** (0.000)	168.286*** (0.000)	80.900* (0.054)
旅游业发展 <i>Tour</i>	-3.558*** (0.000)	-2.258** (0.012)	55.222*** (0.000)	-0.064 (0.475)	154.860*** (0.000)	45.981 (0.936)
D(<i>Tour</i>) 一阶差分	23.350 (1.000)	-9.963*** (0.000)	-2.375 (0.991)	-5.340*** (0.000)	242.086*** (0.000)	429.459*** (0.000)
经济开放度 <i>Open</i>	-1.658** (0.049)	-1.846** (0.032)	20.210*** (0.000)	-0.726 (0.234)	147.647*** (0.000)	40.586 (0.984)
投资水平 <i>Invest</i>	-2.994*** (0.001)	5.816 (1.000)	64.155*** (0.000)	3.702 (1.000)	151.214*** (0.000)	31.201 (1.000)
政府干预 <i>Govern</i>	-2.120** (0.017)	7.365 (1.000)	68.915*** (0.000)	3.017 (0.999)	143.527*** (0.000)	41.750 (0.978)
人力资本 <i>Human</i>	-3.142*** (0.001)	15.687 (1.000)	66.548*** (0.000)	2.583*** (0.995)	184.346*** (0.000)	37.582 (0.994)
科技创新 <i>Tech</i>	36.193 (1.000)	17.520 (1.000)	64.245*** (0.000)	29.903 (1.000)	39.989 (0.987)	6.731 (1.000)
城市化水平 <i>Urban</i>	-1.107 (0.134)	13.834 (1.000)	62.301*** (0.000)	5.641 (1.000)	163.426*** (0.000)	222.796*** (0.000)
消费环境 <i>Consume</i>	0.108 (0.543)	-2.149** (0.016)	33.211*** (0.000)	1.691 (0.955)	203.848*** (0.000)	58.066 (0.618)
经济发展水平 <i>Dev</i>	-10.103*** (0.000)	16.731 (1.000)	75.781*** (0.000)	-0.123 (0.451)	125.738*** (0.000)	19.929 (1.000)

注:括号内为 p 值;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显著性水平

由上述结果可知,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检验统计量基本显著,表明各变量均为平稳序列。但解释变量在 IPS 和 Fisher-PP 检验中未能通过平稳性检验。对此,本文参考赵磊和张晨(2017)^[36]做法,对旅游业发展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从一阶差分检验结果可知,该变量为一阶单整 $I(1)$,说明其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基于上述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该样本数据可以进行下一步回归分析。

此外,本文分别通过 Pearson 相关系数和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两种方法,进一步验证了变量间的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各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未超过 0.6,且其 VIF 值也都未超过膨胀因子的最大容忍度 10,表明该模型基本不受多重共线性干扰。限于文章篇幅,结果未予呈现,备索。

2.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基于前文理论模型,本文首先运用混合 OLS、固定效应及随机效应检验了旅游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具体结果分别如表 3 第(1)~(3)列所示。基于固定效应 F 统计量(p 值为 0.00)及 ρ 值(0.683)结果和豪斯曼检验(p 值为 0.00)结果,表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比混合 OLS 和随机效应更优。因此,由第(2)列结果可知,旅游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 1%

的统计水平显著为正,其影响系数为 0.082,表明旅游业发展可以有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为进一步验证旅游业发展是否更利于提高劳动要素份额和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本文还检验了旅游业发展对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其混合 OLS、固定效应及随机效应的具体结果分别如表 3 第(4)~(6)列所示。结果表明,旅游业发展对资本收入份额始终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因此,基准结果表明,旅游业发展可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并能降低资本收入份额,说明旅游业发展可以有利于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可以支持理论假设 H_1 。

这可能由于:一方面,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者会更加注重精神生活质量,从而使旅游业对增加人文因素投入的市场需求比对物质资本投入更高,并可以通过提升劳动要素份额和降低资本要素份额,有效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另一方面,鉴于旅游业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旅游业发展能通过显著的旅游收入效应而更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并使劳动要素的边际收益逐渐比资本要素更高(王佳莹,2021)^[14],从而更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并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此外,基准模型结果可在一定程度上验证劳动和资本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零和博弈假说的合理性。因此,基于文章篇幅限制,本文在后续内生性、稳健性、异质性等分析中仅展示了旅游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劳动收入份额 LIS			资本收入份额 CIS		
	OLS	FE	RE	OLS	FE	RE
	(1)	(2)	(3)	(4)	(5)	(6)
旅游业发展 <i>Tour</i>	0.030 (0.83)	0.082** (2.04)	0.021 (0.53)	-0.197*** (-5.59)	-0.145*** (-3.98)	-0.108*** (-2.69)
经济开放度 <i>Open</i>	-0.181*** (-2.74)	0.371*** (3.74)	-0.015 (-0.16)	0.037 (0.57)	-0.223** (-2.51)	-0.062 (-0.65)
投资水平 <i>Invest</i>	0.046*** (3.01)	0.006 (0.42)	0.032** (2.10)	-0.038** (-2.50)	-0.003 (-0.22)	-0.033** (-2.10)
政府干预 <i>Govern</i>	0.124*** (8.15)	0.045* (1.63)	0.164*** (6.27)	-0.069*** (-4.65)	-0.072*** (-2.95)	-0.127*** (-5.00)
人力资本 <i>Human</i>	-4.463*** (-9.33)	-2.932*** (-4.88)	-4.450*** (-7.29)	2.572*** (5.46)	1.504*** (2.79)	2.915*** (4.72)
科技创新 <i>Tech</i>	0.003*** (8.66)	0.001** (2.07)	0.003*** (9.27)	-0.002*** (-6.26)	-0.001 (-0.57)	-0.002*** (-5.78)
城市化水平 <i>Urban</i>	0.052** (2.18)	0.097*** (4.28)	0.077*** (2.89)	0.101*** (-4.30)	-0.109*** (-5.35)	-0.103*** (-3.77)
消费环境 <i>Consume</i>	0.256*** (6.65)	-0.119** (-2.18)	0.376*** (8.02)	-0.099*** (-2.62)	0.077 (1.57)	-0.190*** (-3.98)
经济发展水平 <i>Dev</i>	-0.039*** (-6.82)	-0.173*** (-11.43)	-0.044*** (-6.31)	0.054*** (9.59)	0.145*** (10.67)	0.050*** (7.17)
年度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地区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常数项	0.757*** (16.04)	2.061*** (14.62)	0.739*** (12.85)	-0.061 (1.32)	-0.922*** (-7.29)	0.011*** (0.19)

续表 3

变量	劳动收入份额 LIS			资本收入份额 CIS		
	OLS	FE	RE	OLS	FE	RE
	(1)	(2)	(3)	(4)	(5)	(6)
观测值	673	673	673	673	673	673
调整 R ²	0.478	0.516	0.439	0.361	0.535	0.336

注:括号内为各统计量 t 值或 z 值; *、**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下同

除旅游业发展因素外,其他控制变量也能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产生一定影响。第一,由表 3 估计结果可知,经济开放度对劳动要素份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资本要素份额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该结果与郭庆旺和吕冰洋(2012)^[3]等相关研究基本一致。表明经济开放度可以有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并降低资本要素份额,这可能由于对外开放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充裕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并缓解部分由垄断租金而引起的议价能力降低等不利因素(郭庆旺和吕冰洋,2012)^[3],从而有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并降低资本收入份额。

第二,政府干预和城市化水平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对资本收入份额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该结果与郑新业等(2018)^[17]等研究基本一致。由政府干预结果可知,各地政府可通过调整资本收入税收和优化财政政策等方式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以进一步缓解其收入分配差距(郭庆旺和吕冰洋,2012^[3];徐常建和袁易明,2018^[37])。由城市化水平结果可知,城市化水平可通过促进劳动要素的城乡流动,进一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并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结构(郭庆旺和吕冰洋,2012^[3];郑新业等,2018^[17])。

第三,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环境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基准结果表明该类因素能更利于提高资本收入份额,其结果与相关研究(李稻葵等,2009^[6];郭庆旺和吕冰洋,2012^[3])基本一致。李稻葵等(2009)^[6]提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可能存在“U”型发展规律,因此,基于我国社会经济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基本事实,其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环境和人力资本等对劳动要素份额的影响可能也处于曲线左边,从而表现出更利于增加资本要素份额。此外,表 3 结果显示,科技创新和投资水平对劳动要素份额和资本要素份额的影响较小,表明二者尚未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表现显著积极影响。

3. 内生性分析

为解决由不可观测变量等其他遗漏变量及反向因果等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旅游业发展的一阶滞后项作为模型的工具变量(王佳莹和张辉,2021)^[38]。基于内生性模型,本文首先通过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析了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结果如表 4 第(2)列所示。结果表明,弱化了内生性问题后,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均有所下降,但其系数仍在 10% 统计水平显著为正。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运用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和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进一步解决其内生性问题,结果如表 4 第(3)列和第(4)列所示。由检验结果可知,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系数仍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证明基准检验结果具有可信度。

表 4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OLS	2SLS	LIML	GMM
	(1)	(2)	(3)	(4)
旅游业发展 <i>Tour</i>	0.083 ** (2.04)	0.072 * (1.64)	0.072 * (1.64)	0.072 * (1.4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续表 4

变量	OLS	2SLS	LIML	GMM
	(1)	(2)	(3)	(4)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2.370 *** (14.61)	2.542 *** (12.82)	2.542 *** (12.82)	2.542 *** (12.82)
观测值	673	642	642	642
调整 R ²	0.807	0.802	0.802	0.802

4.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首先,本文将旅游人次比作为旅游业发展的解释变量,其替换变量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5 第(1)列和第(2)列所示。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人次比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均比旅游专业化变量更小,但仍在 10% 显著性水平显著为正,表明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结果具有稳健性。其次,借鉴方红星和楚有为(2019)^[39]等研究,本文改变了部分控制变量,第(3)~第(4)列分别为删除投资水平和政府干预变量的影响结果。结果表明,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参考冯烽和崔琳昊(2020)^[40]等研究,本文运用剔除异常值方法对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剔除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双侧 5% 异常值(西藏与广西为较高 5% 样本,上海与天津为较低 5% 样本),其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结果如第(5)~第(6)列所示。相比基准回归结果,其影响结果变化不大,仍在 5% 水平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正向影响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替换变量 <i>Tour'</i>		改变控制变量		剔除异常值	
	FE	RE	<i>Invest</i>	<i>Govern</i>	FE	RE
	(1)	(2)	(3)	(4)	(5)	(6)
旅游业发展 <i>Tour</i>	0.002 * (1.66)	0.003 *** (3.81)	0.085 ** (2.16)	0.092 ** (2.30)	0.070 ** (1.65)	0.043 (1.04)
经济开放度 <i>Open</i>	0.341 *** (3.32)	-0.013 (-0.14)	0.364 *** (3.73)	0.370 *** (3.73)	0.333 *** (2.68)	-0.029 (-0.26)
投资水平 <i>Invest</i>	0.010 (0.79)	0.027 * (1.76)		0.010 (0.77)	0.024 (1.61)	0.035 ** (2.04)
政府干预 <i>Govern</i>	0.056 ** (2.08)	0.170 *** (6.59)	0.047 * (1.76)		-0.098 (-1.81)	0.231 *** (4.93)
人力资本 <i>Human</i>	-3.050 *** (-4.98)	-4.534 *** (-7.50)	-2.877 *** (-4.91)	-3.158 *** (-5.39)	-2.175 *** (-3.18)	-4.065 *** (-5.95)
科技创新 <i>Tech</i>	0.001 (1.63)	0.003 *** (8.47)	0.001 ** (2.03)	0.001 * (1.71)	0.001 (1.25)	0.003 *** (8.46)
城市化水平 <i>Urban</i>	0.095 *** (4.19)	0.077 *** (2.92)	0.097 *** (4.28)	0.093 *** (4.12)	0.046 *** (1.45)	0.075 ** (2.03)
消费环境 <i>Consume</i>	-0.098 * (-1.85)	0.325 *** (7.06)	-0.120 ** (2.20)	-0.131 ** (-2.43)	-0.196 *** (-3.25)	0.364 *** (7.42)

续表 5

变量	替换变量 <i>Tour'</i>		改变控制变量		剔除异常值	
	FE	RE	<i>Invest</i>	<i>Govern</i>	FE	RE
	(1)	(2)	(3)	(4)	(5)	(6)
经济发展水平 <i>Dev</i>	-0.171 *** (-11.32)	-0.051 *** (-7.19)	-0.172 *** (-11.68)	-0.179 *** (-12.11)	-0.202 *** (-11.59)	-0.051 *** (-6.39)
年度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地区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常数项	2.040 *** (14.55)	0.819 *** (13.75)	2.049 *** (14.83)	2.120 *** (15.54)	2.360 *** (14.36)	0.797 *** (12.28)
观测值	673	673	673	673	589	589
调整 R ²	0.518	0.448	0.518	0.491	0.342	0.338

五、异质性分析

1. 地区异质性分析

为验证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异质性,我国 31 个省份 1998—2020 年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值结果如图 2 所示。结果显示,一方面,对于西藏(0.615)、广西(0.569)、贵州(0.540)、海南(0.535)、宁夏(0.532)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其劳动收入份额均值比中部和东部地区更高,说明该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比资本收入份额更高;另一方面,对于上海(0.387)、天津(0.404)、山东(0.424)、黑龙江(0.442)、浙江(0.442)、江苏(0.446)等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言,其劳动收入份额均值比西部和中部地区更低,说明该地区的资本收入份额比劳动收入份额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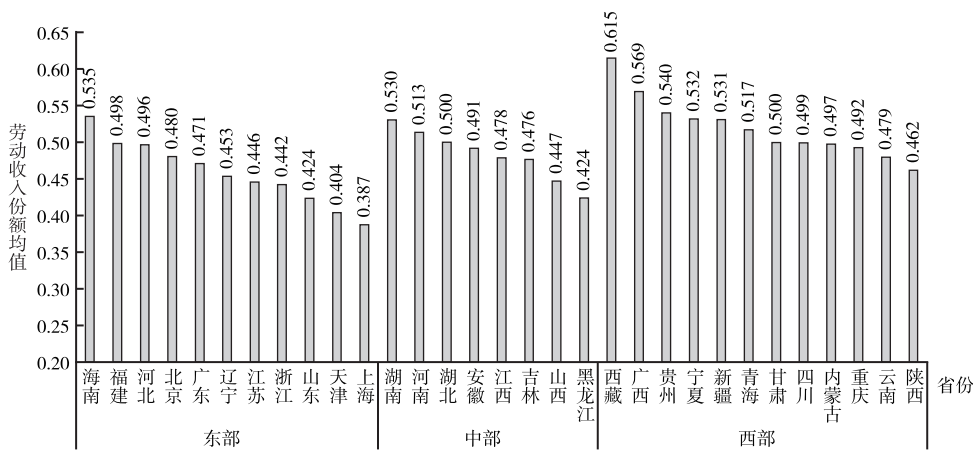


图 2 各省份劳动收入份额均值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鉴于上述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地区差异,本文进一步探究了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地区异质性影响,结果如表 6 第(1)~(3)列所示。结果表明,旅游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西部地区显著为正,其固定效应模型的影响系数为 0.182,说明旅游业发展更利于提高西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而非资本收入份额。这可能由于,基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和环境优势,西部地区都将旅游业视为战略支柱产业,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要素更易

通过发展旅游业而有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王松茂等,2020)^[10]。此外,基于旅游业劳动密集型特征,该地区旅游业对促进社会就业和提高居民劳动收入的积极作用,可能比中部和东部地区更为突出(苏建军和孙根年,2017)^[12],从而能更利于通过旅游收入效应而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

然而,旅游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则显著为负,说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其他产业可能比旅游业更具地理区位优势 and 资本投资优势,从而使其对提升资本收入份额的积极作用表现更为突出。而且,与东部与中部地区的能源和制造业等其他主导产业相比,旅游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作用可能比其他产业更小(郭宇航和孔微巍,2020)^[13],从而会更利于提升资本收入份额。

表 6 地区和时序异质性影响结果

变量	地区异质性			时序异质性	
	东部	中部	西部	1998—2008	2009—2020
	(1)	(2)	(3)	(4)	(5)
旅游业发展 <i>Tour</i>	-0.271*** (-2.86)	-0.200** (-2.55)	0.182*** (3.11)	-0.471*** (-2.98)	0.041* (1.2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120 (-1.12)	0.460*** (2.72)	0.939*** (9.09)	1.152*** (7.96)	0.758*** (8.55)
观测值	241	174	258	341	332
调整 R ²	0.215	0.300	0.418	0.552	0.169

2. 时序异质性分析

基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可能存在“U”型发展假说(李稻葵等,2009)^[6],本文进一步验证了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影响的时序差异性(钱学锋和王备,2017)^[41]。鉴于2008年金融危机和我国在2008年前后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本文选择以2008年为界,分别探究了旅游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在1998—2008年和2009—2020年的时序异质性影响,其结果如表6第(4)列和第(5)列所示。结果表明,旅游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1998—2008年显著为负,其固定效应模型的影响系数为-0.471,而在2009—2020年则显著为正,其影响系数为0.041。当在经济发展初期和旅游业发展水平较低时,基于旅游投资和物质资本的稀缺性,旅游业发展会更利于提高资本收入份额。然而,随着公共服务设施的不断完善和旅游产业业态创新和转型升级,旅游业发展对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更为突出,并能通过旅游收入效应而不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从而使旅游业发展在不同阶段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时序异质性特征。

3. 分位数异质性分析

为反映旅游业发展在不同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条件位置分布上的异质性影响,本文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王佳莹和张辉,2021)^[38],揭示不同的劳动收入份额水平上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效应。本文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0.1、0.3、0.5、0.7和0.9分位处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第(1)~(5)列所示。

表 7 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0.1 分位处	0.3 分位处	0.5 分位处	0.7 分位处	0.9 分位处
	(1)	(2)	(3)	(4)	(5)
旅游业发展 <i>Tour</i>	0.077 (0.92)	0.080* (1.40)	0.082** (1.70)	0.085* (1.35)	0.087 (0.9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73	673	673	673	673

由各模型结果可以看出,除 0.1 和 0.9 分位处外,各分位点上旅游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基准模型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旅游业发展在五个分位处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77、0.080、0.082、0.085、0.087,由此可知,随着分位点的增加,其影响系数也在逐渐增大。这一结果表明,旅游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当劳动收入份额越高,旅游业发展则能更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这可能是由于,旅游业发展对外部社会经济环境具有突出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与当地社会经济条件和居民收入水平息息相关(刘英基和韩元军,2020)^[11]。当一个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较低或资本收入份额较高时,其旅游业发展会受限于资本收入要素的虹吸效应,较难突出其旅游就业功能和旅游收入效应。然而,随着劳动收入份额的逐渐提升和资本收入份额的不断降低,其旅游收入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也会更加显著,从而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表现为正向积极影响。

为更加直观展现旅游业发展对劳动要素份额的分位数异质性影响,图 3 为不同分位数的影响结果及其 95% 的置信区间,本文还将基准回归结果用虚线标出,以作为对比分位数影响系数变化的参照系。一方面,图 3 进一步反映了旅游业发展系数会随分位点的增加而逐渐增大的变化趋势,说明旅游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作用,会随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而逐渐增强;另一方面,由图 3 阴影部分所表示的 95% 的置信区间可以看出,在条件位置分布的最大和最小的左右两端,其 95% 置信区间范围较大,这可能与影响系数的标准误差在分位点两端更大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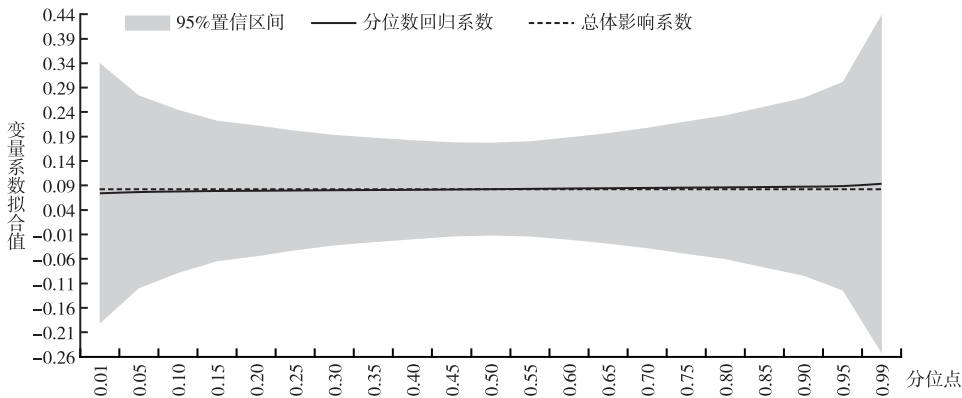


图 3 旅游业发展对不同分位数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异质性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六、结论与启示

1. 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我国 31 个省份 1998—2020 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效应。主要结论包括:第一,基准结果表明,旅游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对资本收入份额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旅游业发展可以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第二,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旅游业发展对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作用在西部地区表现更为突出;时序异质性结果表明,二者正向影响在2008年后开始凸显;分位数影响结果表明,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在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分位处表现更为显著。本文从旅游收入效应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属性视角,揭示了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原理,不仅可以丰富和拓展要素禀赋和旅游社会经济影响等相关理论的研究范畴,也能为如何发挥旅游收入效应在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中的实践价值提供有益参考。

2. 管理启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新常态阶段,传统制造业中较高的资源、土地、设备等资本要素投入不利于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和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而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旅游业发展对提高劳动、信息、创新等人力资本及劳动收入要素的积极作用逐渐突出。尤其随着旅游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人们将更加关注劳动要素投入所决定的软性服务品质和人文体验价值,而不是外在的硬性设施条件和其他资本要素投入,因而劳动收入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也会越来越高。

因此,旅游目的地和企业应充分发挥劳动要素在提升旅游竞争力和优化要素分配结构中的积极作用,本文得到以下管理启示:第一,为进一步发挥旅游业对带动居民就业和提高劳动收入的积极作用,当地社区和企业可积极推进旅游业与文化、信息、科技等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融合发展,并通过设立非遗工坊及其他就业帮扶车间等方式,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在旅游业中的参与积极性和文化创造力,以进一步提高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第二,旅游目的地和企业还可通过优化旅游利益分配制度、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和建立科学监管体系等方式,有效提高社区居民在旅游业参与中的劳动性收入比例,并进一步扩大旅游收入效应和乘数效应。第三,基于旅游者对文创、非遗等软性服务品质要求,各企业和目的地可深入挖掘和寻找当地社区劳动者中关于刺绣印染、纺织服饰、编织扎制、雕刻彩绘、传统建筑、金属锻铸、剪纸刻绘、陶瓷烧造、文房制作、漆器髹饰、印刷装裱、器具制作等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人,以激发劳动者创新创造活力,并进一步提高信息、技术、人才、创新、品牌、服务等人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边际价格和收益。第四,为有效促进旅游市场和劳动者的跨区域流动,各地可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和提升旅游便利化水平,并通过促进不同区域间旅游信息、技术和知识等其他生产要素流动,而进一步发挥旅游业发展对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积极作用。

3. 研究展望

本文还存在以下拓展空间和方向:首先,本研究从旅游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属性验证了旅游业发展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效应,未来可从人力资本、创新技术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属性出发,进一步拓展和丰富旅游业发展对收入分配结构影响的相关研究。其次,本研究从劳动和资本要素解构方面考察了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作用,未来还可从分配制度、政策体系等其他角度进一步探究旅游业发展对促进社会公平的积极作用。最后,本研究从宏观要素收入分配视角探究了旅游业发展对提高劳动要素份额的积极作用,未来还可从居民收入来源和旅游就业收入等微观视角,进一步探究旅游业发展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机制,如从微观个体的劳动和资本收入分配结构视角,进一步深化旅游业发展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研究。

参考文献

- [1] 雷琼. 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内涵、困境与制度创新:基于乡村治理视角[J]. 广州: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2,(4):44-55.
- [2] 王思斌. 乡村振兴中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与共同富裕效应[J]. 上海:探索与争鸣,2022,(1):110-118.

- [3] 郭庆旺,吕冰洋.论要素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2,(12):46-62.
- [4] 高敬峰,张艳华.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与要素报酬解构[J].上海:世界经济研究,2014,(7):22-27.
- [5] 刘亚琳,申广军,姚洋.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新变化与再考察[J].北京:经济学(季刊),2022,(5):1467-1488.
- [6]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北京:经济研究,2009,(1):70-82.
- [7] 侯俊军,钟灵子.要素禀赋结构与标准供给——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长沙: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66-72.
- [8] 刘亚琳,茅锐,姚洋.结构转型、金融危机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J].北京:经济学(季刊),2018,(2):609-632.
- [9] 胡文海,柳百萍.基于“三农旅游”发展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以合肥市为例[J].北京:农业经济问题,2009,(8):84-86.
- [10] 王松茂,何昭丽,郭英之,郭安禧.旅游减贫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吗?[J].北京:经济管理,2020,(5):103-119.
- [11] 刘英基,韩元军.要素结构变动、制度环境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J].北京:旅游学刊,2020,(3):28-38.
- [12] 苏建军,孙根年.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地区差异[J].银川:宁夏社会科学,2017,(3):71-80.
- [13] 郭宇航,孔微巍.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结构影响效应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117-128.
- [14] 王佳莹.旅游化对地区发展不平衡影响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21.
- [15] Alam, M. S., and S. R. Paramati.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Income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Does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Exist?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6, 61: 111-126.
- [16] Sun, S., and W. Lu.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aiwanese Hotel Industry Using a Weight Slacks-based Measure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5, 22, (4): 487-512.
- [17] 郑新业,张阳阳,马本,张莉.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新机制与新证据[J].北京:经济研究,2018,(8):132-146.
- [18] Atkinson, A. B. 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 of Income: Evidence and Explanation [J]. *German Economic Review*, 2000, 1, (1): 3-18.
- [19] 郭庆旺,吕冰洋.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J].北京:经济研究,2011,(6):16-30.
- [20] Incera, A. C., and M. F. Fernández. Tourism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a Developed Regional Economy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5, 48, (6): 11-20.
- [21] Bowden, J. Pro-poor tour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5, 10, (4): 379-398.
- [22] 王佳莹,张辉.旅游发展、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不平衡[J].上海:旅游科学,2021,(2):73-94.
- [23] Yang, Y., and T. Fik. Spatial Effects in Regional Tourism Growth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4, (46): 144-162.
- [24] 王坤,黄震方,余凤龙,曹芳东.中国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研究[J].北京:旅游学刊,2016,(5):15-25.
- [25] Wooldridge, J. M.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3.
- [26] 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北京:经济研究,2009,(3):27-41.
- [27] 邓晓兰,鄢伟波.中国式分权、金融化与要素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实证检验[J].南昌:当代财经,2019,(9):48-59.
- [28] 张万里,宣畅.产业智能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调节作用[J].北京:经济管理,2020,(10):77-101.
- [29] 黎峰.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是否有利于贸易收益的提升?——基于中国的行业面板数据[J].上海:世界经济研究,2014,(8):3-7.
- [30] Liu, J., P. Nijkamp, and D. Lin. Urban-rural imbalance and Tourism-Led Growth in China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7, (64): 24-36.
- [31] 赵磊,方成,毛聆玲.旅游业与贫困减缓——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北京:旅游学刊,2018,(5):13-25.
- [32] 林爽,赵磊.城镇化进程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门槛效应研究[J].北京:旅游学刊,2020,(11):27-41.
- [33] 丁任重,张航.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互动——基于空间多重形式分析[J].西安:当代经济科学,2020,(5):16-27.
- [34] 王天营,沈菊华.样本数据缺失的灰数补救方法[J].武汉:统计与决策,2008,(22):7-10.
- [35] 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 [36] 赵磊,张晨.旅游业会影响城镇化经济增长效应吗?——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J].北京:旅游学刊,2017,(10):57-66.
- [37] 徐常建,袁易明.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J].郑州:经济经纬,2018,(6):121-126.
- [38] 王佳莹,张辉.国际旅游能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吗?[J].北京:经济管理,2021,(5):75-92.
- [39] 方红星,楚有为.自愿披露、强制披露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J].北京:经济管理,2019,(1):156-173.
- [40] 冯烽,崔琳昊.高铁开通与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引擎”还是“过道”?[J].北京:经济管理,2020,(2):175-191.
- [41] 钱学锋,王备.中间投入品进口、产品转换与企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J].北京:经济研究,2017,(1):58-71.

Whether Tourism Development is in Favor of Optimiza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WANG Jia-ying¹, ZHANG Hui²

(1. School of Tourism and Cuisin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involves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system of national income. Exploring how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capital and labor factor distribution and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basic role of initial distribution is a vital subject to narrow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and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However,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focus on explor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level of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and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rationality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its internal factors. Moreo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pays less attention to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labor-intensive service industries like tourism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In this regard, based on the labor-intensiv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and tourism income effec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from 1998 to 2020 in China, this study made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by using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abor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while i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capital factor income, indicating that tourism development can optimize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through significant tourism income effect. Secondly, from the results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optimizing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is more promin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an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in China.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results of temporal heterogeneity influence, this positive effect began to be significant after 2008.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results of quantile heterogeneity that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is more significant at the quantile of larger income distribution of labor factors.

Give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ptimization effe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ctor deconstruction, which can not only enrich and expand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categories such as regional economy and tourism fairness research, but als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how to give play to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ourism income effect in optimizing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and narrowing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As China's economy shifts from rapid growth stage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traditional driving forces such as manufacturing urgently need to be optimized and upgraded. The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has become a new engine for accelera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enhanc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as a typical labor-intensive and knowledge-based service industry, the role of tourism in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meeting people's aspirations for a better lif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refore, tourism destinations and enterpris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humanistic and emotional value of tourism products and the quality of soft services. And they can increase lab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other labor factors input, to further play the positive rol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improving labor factor income and optimizing the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To be specific, firstly, in order to further play the positive role of tourism in driving the employment of residents and improving labor income, local communities and enterprises can fully mobilize the participation enthusiasm and cultural creativity of residents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They can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ourism with labor-intensive and knowledge-intensive industries such as culture,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and set up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orkshops and other employment support workshops, so as to fully improve the marginal revenue of labor factors and human capital. Secondly, tourism destinations and enterprises can optimize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of tourism benefits and establish a scientific supervision system, to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residents' labor income and to further enhance the tourism income effect and multiplier effect. Thirdly, based on the tourists'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of cultural, creativ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other soft services, enterprises and destinations can deeply explore the inheritors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and skills among local workers, such as embroidery, dyeing, weaving, carving, painting, etc. And they can also encourage labor and employees to creatively transform and develop local culture, and improve th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human capital and labor factors by increasing the added value of tourism products. Finally, in order to fully leverage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optimizing the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regions can also improve the convenience of tourists' cross-regional flow to provide infrastructure guarantee for promoting the flow of tourism market, labor force and other factors, so as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the tourism supply-side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nd exp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chai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Key Words: tourism development;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labor income share; tourism income effect

JEL Classification: E25, O15, J21

DOI:10.19616/j.cnki.bmj.2023.06.011

(责任编辑: 闫 梅)